

并绘制药材形态图 379 幅, 著成《本草原始》一书。可视为我国第一部药材专著, 该书的文字内容虽系《本草纲目》节要改编, 但自绘药材图, 则是其特色和价值所在。

#### 四、药事制度

明王朝重视医药, 并承袭了宋元以来的医药制度。洪武初年, 朱元璋说: “三皇继天立极, 开万世教化之原, 汨于药师可乎?” 因此, 明代在祭祀三皇时都把历代名医作为从祀。嘉靖年间建三皇庙, 都配建东西两庑, 列历代名医, 各府州县也以此为遵。这种做法无疑提高了医药人员的地位。与此同时, 也建立了严格的医药制度。

据《明史·职官志》载: “太医院院使一人, 院判二人, 其属御医四人, 吏目一人, 生药库、惠民药局各大使一人, 副使一人。” “太医院掌医疗之法, 凡医术十三科……凡药, 辨其土宜, 择其良楛, 慎其条制而用之。四方解纳药品, 院官收贮生药库, 时其燥湿, 礼部委官一员稽察之。诊视御脉, 使、判、御医参看校同。会内臣就内局选药, 连名封记药剂, 具本开写药性、证治之法以奏。烹调御药, 院官与内臣监视, 每二剂合为一, 候熟, 分二器, 一御医、内臣先尝, 一进御。仍置历簿, 用内印铃记, 细载年月缘由, 以凭考察。” 王府、文武大臣、外国使节求医, 由太医院派人往诊, 并写出报告。各府、州、县均置“惠民药局”。边关卫所及人聚处, 设医官、医生、医士, 均由太医院选派。这种严格的医药制度, 对医药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明代的刑律中有如下条文: “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 误不用本方因而致死者, 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如无伤害之情者, 以过失杀人论, 不许行医。若故违本方, 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 计赃准窃盗论; 因而致死及因事故用药杀人者斩。” 说明那时对医疗事故的处理有严厉的规定。

明代的医学教育仍以家传师授为主, 但未见对药学家材的培养有何特别措施。此外, 明代的黄册制度规定, 子承父业, 不得改变户籍, 客观上对发现和培养人才也是一种限制。

尽管明代的医药制度有了明显的进步, 但也并非完美无缺。明代多次瘟疫的流行, 说明医药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尽管新药不断发现, 藩属入贡不断增加, 药材生产也不断提高, 但都不能克服医药制度主要服务于封建王朝的局限。

#### 五、中外药学的交流

明代的航海交通在宋元基础上又有较大规模的发展, 因而促进了中外药学的进一步交流。三保太监郑和从 1405 年至 1433 年的 28 年中, 七次下“西洋”, 到达 30 余个国家, 把中国著称于世的特产药材传播到亚、非、欧各地。与此同时, 也把外国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和许多药物带回中国, 有的还移植和饲养在南京狮子山下的静海寺内。后来, 为研究海外药物, 李时珍到南京曾特地到静海寺作过实地考察。

明代海外药物的输入, 据文献记载一般来自朝鲜、日本、琉球、越南(安南、交趾)、真腊、泰国(暹罗)、占城、爪哇(一作下港)、彭亨(一作彭坑)、三佛齐(或作旧港)、浣泥(一作文莱)、苏门答腊、暹那、淡巴、苏禄、古里、刺加(一作麻大甲)、婆罗、阿鲁(一作哑鲁)、小葛兰(一作唛喃)、榜葛刺、锡兰(斯里兰卡)等国。药物有以下几类: ①矿物类: 硫黄、玛瑙、珊瑚。②植物类: 苏木、降真香、木香、丁香、檀香、沉香、奇南香、金银香、胡椒、片脑、半脑、脑油、脑柴、安息香、乳香、没药、蔷薇水、阿魏、藤黄、乌爹泥、肉豆蔻、白豆蔻、萆薢、大风子、血竭、芦荟、番木鳖、萆薢茄、香油子、苏合油、梔子花、人参、乌木。③动物类: 犀角、羚羊角、冈虫药、黄腊、龙涎香、象牙、玳瑁、紫胶。

这一时期中外医药学交流较多。朝鲜不断派留学生到我国

学习中医药, 并将大量的医药书籍带回朝鲜, 广为传播。朝鲜的医家还对中医药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和钻研, 如金礼蒙对我国 15 世纪以前的 150 多种中医药典籍进行分类编撰成大型的中医药类书《医方类聚》(1445 年), 全书 266 卷, 分为 92 门, 收方 5 万多首, 约 950 万字。其中保存了不少我国现已散佚的资料, 堪称 15 世纪以前中国医方之大成。1611 年朝鲜医家许浚分类汇编《东医宝鉴》, 对介绍我国医药学到朝鲜亦作出了贡献。1617 年朝鲜派御医崔顺立前来我国太医院学习, 互相讨论, 以后由傅懋光将答疑与讨论内容整理成 38 则, 汇编成《医学疑问》一书刊行。

中日两国的医药交流也日益频繁, 当时我国名医曾赴日本行医、讲学。如江右人许仪明曾定居萨摩为医。杭州人陈明德在日本崎香行医, 其医术高超, 著有《医录》行世。杭州人戴曼公, 万历时曾跟随名医龚廷贤学医, 明乱后归隐, 赴日本, 定居崎香, 以治痘禁方授日人池田嵩山, 遂名著于世。明末张若水赴日本时, 也带去了大批医药书籍。与此同时, 日本也有人先后来中国学习医药, 如竹田昌庆、吉田宗桂、吉田意等。1487 年, 日本田代三喜来华学习中医药, 1498 年回国后大力倡导李东垣、朱丹溪学说, 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福药剪剪》等书。1606 年林道春将《本草纲目》带回日本, 献给幕府, 其后《本草纲目》在日本数次翻刻, 有几种版本, 使日本掀起学习和研究《本草纲目》之风, 并产生一批后继性本草。

这一时期中越往来也较密切。越南很重视学习中医药, 中国的《医学入门》、《景岳全书》等近世之作很快传入越南。越南名医黎有卓在参阅《内经》等中医古籍的基础上, 撰成《海上医学心领》一书, 对中越两国的医药交流作出了贡献。越南所产的大量药材也源源不断输入我国。

当时还有若干西方人士致力于中医药的介绍和翻译工作。1557 年西班牙传教士回国时携去了大批中国的医药书籍。而西方传教士的来华, 也传入了西方的医药知识。16、17 世纪, 意大利人范士安、利玛窦、罗坚尼, 德国人汤若望等相继来华传教, 以后又有庞迪俄、龙华民、熊三拔、邓玉函等来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 也带来了西洋的天文、数学、地理、医药等。汤若望的《立制辟征》、熊三拔的《药露说》、邓玉函的《泰西人身概说》等, 都是与医药有关的书籍。其中西方制取药露的方法, 丰富了我国的制药技术。我国医家王肯堂曾与利玛窦切磋医学, 并在其《疡科准绳》中介绍过西方的解剖学知识。但是, 由于当时西医学的总体水平不高, 而解剖学知识尚不能与临床密切结合, 所以对中国的医药学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相反, 传教士们都认真学习中文, 熟悉并掌握中国各方面知识和情况, 尤其注意中国的医药。如邓玉函研究中国本草学书籍达 80 多种。1643 年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到中国, 对部分中医理论、脉学与药物知识进行翻译, 后来在欧洲陆续出版。他的第一本译著《中国植物志》(拉丁文)就是《本草纲目》的植物药部分的节译。继之又有一批人将《本草纲目》节译成英、德、法、俄等各种文字。对西方的医药学与植物学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时当归、大黄、鹿茸、人参等“神州上药”也大量出口, 成为世界药品市场上的重要商品。另外, 葡萄牙传教士石振铎曾著《本草补》介绍了西方药物, 后被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加以引用。

### 第八节 清代的本草学 (1644—1911年)

清朝建立后的一百多年间, 采取了一些适应生产发展的措施, 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康乾盛世”。这时, 西方资本主义日渐兴